

# 埃及努比亚人问题的历史透视

赵 军

**摘 要：**埃及努比亚人问题是一个历史遗留难题。长期以来，埃及政府禁止公开讨论努比亚人的权利并否定存在相关问题。穆巴拉克执政后期，努比亚人问题开始进入公众视野。努比亚人借助发生的重大社会事件和政治事变，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族群动员和政治参与，将回迁权作为争取族群基本权利的中心内容，并围绕回迁权与政府进行了多次博弈。2014年埃及新宪法将努比亚人的回迁权写入相关条款，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法律依据，但由于努比亚人问题的复杂性，短期内仍无法得到彻底解决，或许仍会影响当前埃及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关键词：**埃及政府；努比亚人；少数民族；回迁权；宪法

当代努比亚人问题是埃及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的一个历史遗留难题。该问题发轫于英国殖民埃及期间，留存至今。长期以来，埃及共和国政府不认可努比亚人的少数民族地位，在国内或回避或禁止讨论有关努比亚人的基本权利问题，甚至一度禁止外国人进入努比亚人的生活区域，在国际场合也一再否定国内存在这一问题。埃及政府的回避与否认并不代表不存在该问题，也并不表明相关问题已得到了妥善解决。在穆巴拉克执政后期，努比亚人问题逐渐成为一个可以公开讨论的话题。之后，随着埃及政局的急剧变动，努比亚人从精英到草根开始围绕回归祖居之地的“回迁权”，与政府进行了多次烈度不同的博弈。2014年1月，埃及新宪法通过

公投，努比亚人回迁问题被首次写入宪法，这使这场马拉松式的集体权利诉求及其实现有了新的进展。当前，埃及政府已在着手落实宪法的相关规定，但由于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宪法条文与权利的真切实现之间存在的巨大落差，导致2016年以来努比亚人和政府之间新的持续张力。

由于学界对当代埃及努比亚人及其问题的研究成果相对缺乏，本文拟就努比亚人及其围绕回迁权问题的历史演进作一初步探讨。

## 一、埃及努比亚人及其问题的形成

历史上，埃及的努比亚人是指生活在位于第一

\* 本文系2017年度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和上海市I类高峰学科(外国语言文学)建设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赵军，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邮编200083)。

努比亚人主要分布在苏丹、埃及、肯尼亚等十余个非洲国家。埃及的努比亚人口数仅次于苏丹。1960年埃及政府最后一次发布努比亚人口数据，为98601人。目前，埃及努比亚人的具体数量不详，民间机构认为约有30—300万。参见 Egyptian Center Housing Rights, Individual NGO submission to the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on the Occasion of the 7th Session of the 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 Egypt, 2010, [http://lib.ohchr.org/HRBodies/UPR/Documents/Session7/EG/ECHR\\_UPR\\_EGY\\_S07\\_2010\\_Egyptian Centerfor Housing Rights.pdf](http://lib.ohchr.org/HRBodies/UPR/Documents/Session7/EG/ECHR_UPR_EGY_S07_2010_Egyptian%20Centerfor%20Housing%20Rights.pdf), 查阅时间2016年9月8日。

Robert Fernea, "Thirty Years of Resettlement: The Nubians in Egypt", *Center for Migration Studies Special Issues*, Vol.11, Issue 4, 2012, pp.156—158.

有关埃及努比亚人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四类：第一类聚焦古代努比亚地区及其对外关系，第二类主要探讨古代努比亚建筑和艺术，第三类主要探讨努比亚人的宗教信仰，第四类属于人类学研究方面的成果。

瀑布和第二瀑布之间努比亚地段的人们,即今天的埃及南部阿斯旺地区和苏丹北部的尼罗河沿岸地带。努比亚人属于黑非洲的尼格罗人,他们与古埃及人和阿拉伯人肤色不同,被认为是一个完全异于阿拉伯人的种族。努比亚人曾征服埃及,使古埃及与努比亚地区合并为统一的努比亚王国(古埃及史上的第25朝),并让埃及历史上出现过首位“黑法老”。作为“非洲走廊”的努比亚地区,在麦罗维(Merowe)铁矿枯竭和商贸路线改道后,努比亚人的实际活动空间就此萎缩,但他们仍然倔强地生活在自己民族地缘范畴之中,在与干旱、饥馑、洪水等灾难抗争中创造并延续着独特的努比亚文明。

努比亚人长期孤悬于埃及社会和阿拉伯世界之外,他们起初“与埃及人讲不同的语言,之后又与阿拉伯人讲不同的语言”。在阿拉伯人征服发生数百年之后,许多努比亚人因仅将阿拉伯语作为第二语言使用,而被戏称为“生活在尼罗河上的外来人”。在埃及宗教信仰几度改宗的历史变迁中,努比亚人和平地实现了从基督徒到穆斯林的身份改变,且一直远离宗教纷争和政治运动。即使在近代风起云涌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时期,努比亚人也保持着“平静的努比亚人”的风格。

19世纪后期,英国殖民者入侵并控制埃及,努比亚人的梦魇渐行渐近。1899年,英国殖民者与埃及当局签订《关于共管苏丹的协定》,首次从地缘上割裂了努比亚人的整体存在,努比亚人也开始了“大流散”。从1902年至1964年,埃及努比亚人被迫四次集体迁居,每次迁移都伴随着失去住房、土地,

甚至老人和孩子的生命。1902年,英国在阿斯旺建造水库,蓄水淹没了努比亚人赖以生息的大片土地,努比亚人被迫搬迁至地势较高处。之后,随着尼罗河大量泥沙沉积,河床不断升高。1912年和1932年,英国殖民者两次采取加高水坝的方式来保证蓄水量,这使努比亚人的农地和居所反复被淹,他们只得另寻他处。总的来看,埃及共和国建立之前,迁离尼罗河边到其他地区定居的努比亚人相对有限,绝大多数属于“搬而不离(尼罗河边)”的情况。

20世纪50年代末,纳赛尔政权决定建设阿斯旺高坝,以解决埃及现代化建设中电力不足的问题。阿斯旺大坝建设迫使努比亚人进行最后一次远离尼罗河岸的集体搬迁,从而为今天努比亚人回迁权问题埋下了历史伏笔。1963年10月至1964年4月,44个村庄的5万多名努比亚人全部搬迁至埃及南部的居民安置点,即阿斯旺北部的康翁波地区(Kom Ombo)和埃斯纳地区(Esna)。

努比亚人几乎无人满意新的居住环境,因为新居之地不是靠近被努比亚人视为生命线的尼罗河,而是热浪滚滚、酷热荒凉、干旱缺水的沙漠戈壁。从住房短缺、土地补偿有限、家人联系不便、疾病和死亡随时降临,到忽视了不同的努比亚部落间的敌对情绪等,均让努比亚移民们倍受折磨,也倍感失望。最为严重的是,许多努比亚家庭因未获得政府承诺的安置房,而不得不在安置区外“永久性”地暂居或成为流离失所之人。据统计,1963年10月18日至1964年6月22日,有1.8万个家庭搬离原来住所,<sup>①</sup>流离失所的努比亚人约4.7万人,2013年增至

Fatin Abbas, "Egypt, Arab Nationalism, and Nubian Diasporic Identity in Idris Ali's *Dongola: A Novel of Nubia*",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Vol.45, No.3, 2014, pp.149—150.

郝海迪:《试析努比亚人在埃及的统治》,《阿拉伯世界研究》2007年第5期,第74页。

Williams Yewdale Adams, *Nubia: Corridor to Africa*,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13—48.

詹森·汤普森:《埃及史》,郭子林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7页。

Carolyn Fluehr-Lobban and Richard A. Lobban,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Nubian Identity among Nubians in Egypt, Sud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African Diaspora* edited by Leith Mulling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313.

Sondra Hale, "Nubians in Egypt by Robert Fernea", *African Arts*, Vol.10, No.3, 1997, pp.77—78.

Robert A. Gerster & Georg Fernea, *Nubians in Egypt: Peaceful Peopl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73, Preface. 该协定确定了埃及和苏丹的边界,规定了下埃及的努比亚人归埃及直接管辖,且在政治上独立于苏丹的努比亚人。

Amira Noshokaty, "Egypt Nubia: 50 Years of Displacement", November 2, 2013, <http://english.ahram.org.eg/Newscontent/32/99/>, 查阅时间2016年10月7日。

Hussein M. Fahim, "Community-Health Aspects of Nubian Resettlement in Egypt", *Kroeber Anthropological Society Papers*, Vol.55—56, 1979, pp.81—88.

<sup>①</sup>Enas Hamed, "Will Nubian Demands for Return Become Calls for Secession?" *Al-Monitor*, <http://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4/11/nubia-egypt-displacement-right-return-secession.html>.

8.7万多人,主要分布在法蒂加(AI-Fadigga)、康诺兹(AI-Konnouz)、阿拉伯(Arab)、托马斯·阿菲尔(Thomas Wi Affia)、纳尔斯尔·诺巴(Narsr AI-Noba)五个地方。截至2010年,没有获得失地补偿的努比亚人家庭仍多达5221户。对这部分努比亚人来说,埃及政府承诺的安置住所和补偿土地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一种政治欺骗。“思归”成为不少努比亚人迁徙亲历者挥之不去的情结,1979年甚至发生过一群努比亚人移民悄悄潜回原住处的事件,他们在纳赛尔湖边建造了与其旧宅相似的住所。

如今,历史上的埃及努比亚地区及其独特的物质文化和历史遗迹大部分已静静地躺在纳赛尔湖水之中,但努比亚人仍将回迁至纳赛尔湖边定居视为其族群的基本权利,并围绕“回迁权”与政府进行持续的政治抗争。当前,努比亚人问题似乎一夜之间遽然出现,实不知它已经历太久太多,俨然已成为一个积重待解的现实难题。

## 二、埃及努比亚人的族群权利困境

阿斯旺大坝是埃及阿拉伯民族主义高涨时期的产物,努比亚人问题则是大坝建设的主要副产品之一。在埃及阿拉伯民族主义政策下,努比亚人遭遇的现实并未成为一个显性问题。

纳赛尔政权延续了努比亚人原有的问题并使其生存境况不断恶化,但同时又将之巧妙地雪藏起来。整个纳赛尔时期,努比亚人问题处于沉寂状态。在搬迁动员时,许多努比亚人与埃及民族主义思想保持高度一致,甚至出现过空前支持建设阿斯旺大坝的场景,他们认为“为了埃及的伟大事业”,牺牲他们的旧有家园在所不惜。即使最初在面临安置困境时,不少努比亚人显现出惊人的忍耐力,也并

未因此出现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当时的努比亚人之所以没有成为问题,主要归为两个原因:一是许多努比亚人受宣传影响,认同纳赛尔政权的“民族发展”话语和认同搬迁的合理性;二是在阿拉伯民族主义高涨时期,任何个人的权利要求或某个族群权利诉求几乎没有市场,一旦出现此类要求,埃及社会往往将之视为“自私自利”“觉悟不高”或背叛民族发展计划。于是,当酷热、疾病和死亡来袭时,置身困境且颇有微词的努比亚人要么选择逃离,要么听天由命,选择沉默并耐心地等待政府的解释和憧憬政府的承诺。

如果说纳赛尔政权以一种无法抗拒的方式剥夺了努比亚人原住权的话,那么具有努比亚人血统的萨达特总统则毫无顾忌地使努比亚人失去了更多的基本权利,公开推行“去努比亚化”政策,以巩固单一的阿拉伯民族认同。1971年埃及永久宪法第一条规定:“埃及人民是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埃及人民为实现阿拉伯民族统一而努力。”萨达特认为,认同阿拉伯民族身份就意味着团结,“一个有希望的社会应该像一个大家庭那样团结,而不是像一盘散沙”。永久宪法还规定,新建学校只允许用阿拉伯语教学,这直接剥夺了努比亚人学习本族语言的权利。现实中,埃及政府向努比亚人的祖居之地上迁居阿拉伯人,变相地侵占了努比亚人的土地;用阿拉伯地名重新命名原努比亚人的居住之地,抹去了努比亚人的传统历史印记;学校设置的语言和文化课程不涉及努比亚人的语言、文化和历史;埃及政府的努比亚人代表严重不足,拒绝承担保护努比亚人免受歧视的义务,等等。

在对待国内少数族裔问题上,穆巴拉克政府前20年基本延续了其前任之策,对内实行阿拉伯民族认同政策。埃及虽然是多份有关少数民族权利国

---

Amira Noshokaty, “Egypt Nubia: 50 Years of Displacement”, November 2, 2013, <http://english.ahram.org.eg/Newscontent/32/99/>, 查阅时间2016年10月7日。

Egyptian Center Housing Rights, Individual NGO submission to the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 on the occasion of the 7th Session of the 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 Egypt, 2010.

Yasser Osman MoharamMahgoub, *The Nubian: A Study of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Meanings of Architecture*, A Dissertation for Doctoral Degree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0, p.2.

Hussein H. Fahim, *Aswan High Dam Resettlement of Egyptian Nubians*, Singapore: Springer, 2016, p.18.

Adeed Dawisha, *Arab National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From Triumph to Despair*,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214—251.

苏珊·威尔森《埃及》,王岩译,旅游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237页。

Charles Robert Davidson, “Reform and Repression in Mubarak’s Egypt”, *The Fletcher Forum of World Affairs*, Vol.24, Fall 2000.

际公约的签字国，但在联合国等国际场合，埃及政府坚持阿拉伯民族身份的立场。1994年，埃及代表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的解释性发言中说，“埃及法律制度是以阿拉伯民族统一为基础的，埃及是一个同质性社会，人们只说一种语言（阿拉伯语）”。2001年，埃及代表在同一机构发表着类似的言论，“在埃及，所有人都说同一种语言——阿拉伯语，阿拉伯语是埃及的官方语言，不管是在沙漠地带，还是在沿海地区，在埃及的所有地方，阿拉伯文化均居主导地位，实际上构成埃及人口的所有群体和社区都完全一样”。

在埃及民族主义政策框架下，尽管科普特人等宗教少数族群的地位得到了埃及官方的认可和容忍，但以少数族群（犹太人、亚美尼亚人、柏柏尔人）、外来移民（欧美白人）、土著团体（努比亚人、贝都因人）、什叶派和巴哈伊派等宗教少数派的地位遭到埃及政府的一概否认，所以努比亚人和其他埃及人之间在埃及阿拉伯民族范畴中缺少明确的边界。此外，埃及领导层始终认为，少数民族不利于建构同质的民族国家，致使1960年之后埃及政府不再公布土著居民和少数族群的人口数据。取而代之的是，埃及政府提倡“公民权”，并以此涵盖包括努比亚人等少数族群的一切权利。但正是在住宅权、

受教育权、晋升权和政治参与权等基本公民权的实现过程中，努比亚人发现他们不仅没有获得平等的公民权利，相反某些基本权利已经或正在丧失，且整个族群已被严重边缘化。

尽管有少数埃及努比亚人已成功跻身上流社会，甚至成为国家领导人，但绝大多数努比亚人的受教育程度低，从事着底层工作，如农民、门房、佣人或司机等。有学者认为，埃及社会已将努比亚人视为底层工作者或落后的代名词，努比亚人或因肤色或因受教育程度低而受到埃及社会的普遍歧视，2009年黎巴嫩歌星海法·维赫比（Haifa Wehbe）甚至公然唱出了“（你）这只努比亚猴子（the Nubian monkey）”的歌词。在埃及，除了职业军人外，少数族群或土著居民在政治方面欠缺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机会。此外，努比亚人缺少维护本族群权利的代表，在埃及政治中“几乎没有声音”，“也没有任何机构直接捍卫他们的权利或在影响他们的事务时代表他们发言”。穆巴拉克执政时期，埃及政府在推进纳赛尔湖周边的良田开发计划进程中“忽视努比亚人的回归权”即为明证。努比亚人遭遇的现实，也许正如一位经历过迁徙的老人埃萨姆（HaggEssam）所言：“我们都是埃及人，但在这个国家，平等有点可望而不可及，甚至毫无可能。”

主要指《联合国少数民族权利宣言》（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多元化宣言》（2001年）和《联合国土著居民权利宣言》（2007年）。

UN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Doc. A/49/18, September 15, 1994,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TBSearch.aspx?Lang=En&CountryID=54&ct100\\_PlaceHolderMain\\_radResults-GridChangePage=6](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TBSearch.aspx?Lang=En&CountryID=54&ct100_PlaceHolderMain_radResults-GridChangePage=6), 查阅时间2016年12月4日。

UN, Reports submitted by States Parties under Article 9 of the Convention: Egypt, Doc. CERD/C/384/Add.3, 11 April, 2001,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TBSearch.aspx?Lang=En&CountryID=54&ct100\\_PlaceHolder-Main\\_radResultsGridChangePage=6](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TBSearch.aspx?Lang=En&CountryID=54&ct100_PlaceHolder-Main_radResultsGridChangePage=6), 查阅时间2016年12月4日；UN, Summary Record of the First part of the 1485th Meeting in the 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Doc. CERD/C/SR.1485, Sept.13, 2001, [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TBSearch.aspx?Lang=En&CountryID=54&ct100\\_PlaceHolderMain\\_radResultsGrid-ChangePage=6](http://tbinternet.ohchr.org/_layouts/treatybodyexternal/TBSearch.aspx?Lang=En&CountryID=54&ct100_PlaceHolderMain_radResultsGrid-ChangePage=6), 查阅时间2016年12月4日。

Sherifa Zuhur, “Claiming Space for Minorities in Egypt after the Arab Spring”, in MohaEnnaji (ed.) *Multiculturalism and Democracy in North Africa: Aftermath of the Arab Spring*,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埃及第三任总统安瓦尔·萨达特的母亲是努比亚人，穆尔西执政时期埃及陆军元帅、国防部部长穆罕默德·侯赛因·坦塔维是努比亚人。

Fatma Emam Sakory, “Being Nubian in Egypt, and in the Constitution”, *Mada Masr*, December 23, 2013.

“Haifa Wehbe Enrages the Nubians in Egypt Because of ‘Baba Fein’”, October 12, 2009, <http://wikeez.yasmina.com/en/people/haifa-wehbe-enrages-nubians-egypt-because-baba-fein>, 查阅时间2016年12月8日。

Gamal Nkrumah, “No Benighted Nubia”, *Al-Ahram Weekly*, Issue No.1160, August 15, 2013.

Lauren E. Bohn, “Egypt’s Forgotten Indigenous Minority”, *Pulitzer Center on Crisis Reporting*, May 25, 2013.

Lauren E. Bohn, “Egypt’s Forgotten Indigenous Minority”, *Pulitzer Center on Crisis Reporting*, May 25, 2013.

埃及政府很少信任包括努比亚人在内的由少数族群成立的政治组织,在2011年1月25日革命之前,埃及政府禁止任何努比亚人的集体权利诉求,绝大多数努比亚人组织小心翼翼,尽可能远离政治。如早在1964年成立的“开罗努比亚人俱乐部”,努比亚人从未将之作为动员努比亚人争取合法权利的工具,而用作漂泊在外的努比亚人的联系地点和家庭相聚之所。之后,该俱乐部在亚历山大、阿斯旺、伊斯梅利亚和苏伊士等城市设立了分部,也仅仅发挥了社交和文化论坛的作用。

多年来,埃及政府除了允许在学术和考古领域宣传努比亚的文化发现以及古努比亚人的文化遗址外,严格限制努比亚人组织的发展及宣传努比亚文化的现状,任何鼓励建立拥有努比亚语言和历史的独立组织均被视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而每当努比亚人在国际场合提出努比亚人问题并希望引起国际社会关注时,他们在回国后大多被攻击为分裂分子。

### 三、围绕“回迁权”的族群动员与政治抗争

有学者认为,“当族群以符号的形式建立起自己的社会边界之后,任何企图强制性消除这种边界的公共政策,反而易将族群之间的历史仇恨、现实利益冲突和社会不满放大,从而刺激或强化族群民族主义运动”。努比亚人的族群动员与政治抗争的过程再次证明了上述观点。

以努比亚裔作家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埃及努比亚人的命运给予了最初的理性关注,他们不停地书写着努比亚人对民族认同之艰难、对文明消失之无奈、对流离失所之痛楚以及对移民南部地区所受到的歧视和社会不公的态度。以伊德里斯·阿里(Ildris Ali)、哈桑·努尔(Hasan Nur)、叶海亚·穆赫塔尔(Yehya Mukhtar)和哈加格·哈桑·奥杜尔(Haggag Hassan Oddoul)为代表的后大坝一代(Post-Dam Generation)努比亚裔作家以“伤痕文学”唤起了人们

对努比亚族群迁徙的历史记忆,而迁居后长期流离失所的现实困境和受到的政治压制又使不少努比亚人为争取平等公民权而时刻准备着。

2004—2005年的总统大选前夕,埃及社会反对一党独大的抗议之声此起彼伏,各类抗议组织逐渐改变了政治生态和社会力量结构,为努比亚人争取权利的抗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2004年努比亚人成立了“努比亚文化中心”,之后改名为“努比亚研究与发展中心”,旨在加强努比亚人文化交流、文化保护和社区活动,无形之中该组织也为增强努比亚人的政治参与意识提供了交流平台。2005年,作家奥杜尔在华盛顿召开的“中东自由与民主”大会上发言认为,埃及努比亚人问题是埃及政府种族清洗和反人类罪的结果,呼吁审判那些让努比亚人失去家园的官员。奥杜尔的极端言论虽然受到埃及社会各界的广泛批评,但其言论关涉的现实问题引起了多方关注,并催生一部分努比亚人的维权组织。2005年,埃及住房权利中心开始代理包括住房权利在内的努比亚人集体权利诉求。2007年,老一代努比亚人在开罗、阿斯旺和亚历山大建立了多个“后续行动委员会”,密切关注努比亚人回归权的诉讼情况,同时参与和政府的谈判以及为未来努比亚人建房筹集资金。2008年,海外努比亚人精英在美国华盛顿成立一个名为“努比亚工程”的组织,旨在通过宣传阿斯旺大坝建设、努比亚人阿拉伯化、文化清洗以及努比亚文化边缘化等给努比亚人造成的危险,以警醒本族群,并向非盟、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申请保护努比亚文化遗产。

2008年4月埃及“面包危机”事件触动了城市草根努比亚族群的生存危机意识。努比亚人权利诉求行动出现重要变化:一是从原来的个体或个别组织通过声明的方式,发展到广泛使用社交媒体组织并参与全国性的罢工、抗议和示威游行;二是“回迁祖居之地”成为抗议活动中最重要的权利诉求;三是大量努比亚裔草根青年也加入抗议队伍。2009年,努比亚裔大学生成立“努比亚人民青年联盟”,旨

Gamal Nkrumah, “No Benighted Nubia”, *Al-Ahram Weekly*, Issue No.1160, August 15, 2013.

关凯:《中国民族政策:历史、理论与现实的挑战》,《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

Fatin Abbas, “Egypt, Arab Nationalism, and Nubian Diasporic Identity in Ildris Ali’s *Dongola: A Novel of Nubia*”.

The Nubian Center for Research & Development, <http://www.nubianunion.net/nubian-cultural-center.html>, 查阅时间2016年12月19日。

Rania Khallaf, “Right of Return”, *Al-Ahram Weekly*, Issue No.788, March 30-April 5, 2006.

Ayah Aman, “Egypt’s Nubians Refuse to Allow Heritage to Fall Through Cracks of History”, *Al-Monitor*, August 30.

在“捍卫埃及努比亚人民和少数民族权利”。蒙尼尔·巴希尔(Mounir Bashir)领导的“埃及努比亚人律师联合会”开始接手有关努比亚人回归之地或为努比亚人进行公平补偿损失的诉讼,甚至还起草几份努比亚人回归祖居之地的法律草案。

但在多次维权无果的情况下,2011年“一·二五”革命期间,努比亚人集体走上街头,表达不满。简言之,努比亚人问题在“一·二五”革命前后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一是问题国际化。努比亚人组织向国际人权机构提起权利申诉,试图通过国际法途径解决自身问题,如2010年埃及住宅权利中心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递交了一份涉及认可埃及努比亚人原住民的请愿书。同时,努比亚人积极参与国际维权机构活动,学习其他少数民族维权经验,如“努比亚青年联盟”组织努比亚人参加2011年的哥本哈根“民主青年”大会和在亚历山大举办的“公民春天”工作坊。二是网络动员日益兴盛,如“努比亚日博客”和“努比亚骑士”组织在线等都成为新的重要动员力量;三是以努比亚人身份维权。穆巴拉克政权垮台后,努比亚人开始以努比亚人的身份实施维权行动。两件事情强化了努比亚人的这种倾向。2012年年初,伊斯兰政党联盟控制埃及新议会,拒绝讨论由埃及努比亚人律师协会起草的两份努比亚人回归权的法律草案,此其一;二是在伊斯兰政党控制宪法大会后,将努比亚人集体排除在宪法程序之外,导致努比亚人的集体抗议。2012年4月,新任总理詹祖里(Kamal al-Ganzouri)邀请努比亚人代表讨论有关努比亚地区和阿斯旺大坝南

部地区建设的法律草案,努比亚人空前团结,拒绝接受邀请,并在纳斯尔城内阁临时总部前抗议政府的相关决定。抗议人群认为,包括阿斯旺州州长萨义德(Mostafa al-Sayed)等受邀之人不能代表努比亚人。

2012年6月穆尔西执政后,努比亚人继续积极争取族群权利,但严重受挫,在其批准的2012年新宪法中,没有体现任何少数民族的权益,加之2012年8月12日努比亚裔国防部长坦塔维将军(Mohamed Hussein Tantawi)任职不到两周就被穆尔西解职,导致努比亚人的强烈不满。10月,努比亚人提比(Manal El-Tibi)放弃选区大会议员资格以示抗议。她认为,“新宪法及其制度没有显示任何公正性”。在辞职信中,提比公开谴责宪法大会领导了这场“反革命”。而在2012年11月成立的“努比亚勇士”组织则发表了极端言论宣称,如果他们没有获得努比亚人的政治代表,他们将使用暴力恢复努比亚人的权利,并让努比亚彻底脱离埃及。2013年1月,60多个努比亚人组织齐聚埃及议会大厦外抗议,要求回归祖居之地,结束努比亚人的边缘化政策。同年2月,努比亚裔欧洲人苏莱曼(Hamdi Suleiman)宣布组建“努比亚人问题优先”的“努比亚人尼罗党”,以“抵制那些利用努比亚人问题来实现自我利益的政党”。3月,不知是为了安抚努比亚人,还是注意到努比亚人问题的严重性,穆尔西在总统官邸接见了努比亚人代表团,誓言将结束由埃及历届政府造成的努比亚人社会和文化边缘化的现状。<sup>①</sup>

尽管努比亚人借助埃及连绵不断的政治和社

Humanity in Action, Youth for Democracy: Learning from Non-Violent Struggle across the World, <http://www.humanityinaction.org/programs/42-youth-for-democracy-learning-from-nonviolent-struggle-across-the-world/>, 2012, 查阅时间:2016年12月10日。

该机构会定期对埃及的人权状况作出全面评估。

努比亚人在以往的维权行动中,经常强调自己既是埃及人,也是努比亚人。

“Nubians Boycott Meeting with Prime Minister”, *Egypt Independent*, April 4, 2012.

如宪法第一条强调埃及的阿拉伯和伊斯兰属性,第十条声明埃及政府保护阿拉伯文化的责任,第三十条保护公民,反对不同形式的歧视,但反对包括族群和种族歧视的呼吁并未出现在该条款中。参见 *Egypt's 2012 Constitution*, <http://www.wipo.int/edocs/lexdocs/laws/en/eg/eg047en.pdf>, 查阅时间2016年12月27日。

“Egyptian Premier Meets with Nubians”, *Daily News Egypt*, December 12, 2012.

Manal El-Tibi, “Resignation Letter to Egypt's Constituent Assembly”, *Jadaliyya Reports*, October 12, 2012.

An Unrecognized Majority, <https://www.facebook.com/correspondents.org/posts/144315395725444>, 查阅时间2016年12月28日。

Hassan Kortam, “Nubians Protest Marginalization”, *Daily News Egypt*, January 20, 2013.

“Egyptian Nubians to Launch First-ever Political Party”, February 21, 2013, <http://english.ahram.org.eg/NewsContent/1/0/65291/Egypt/0/Egyptian-Nubians-to-launch-first-ever-political-par.aspx>, 查阅时间2016年12月28日。

① “President Morsi Promises Egyptian Nubians ‘Long Awaited’ Justice”, March 4, 2013, <http://english.ahram.org.eg/NewsContent/1/64/66124/Egypt/Politics-/President-Morsi-promises-Egyptian-Nubians-long-awa.aspx>, 查阅时间2016年12月28日。

会危机,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抗争,但未获得任何期待的结果:族群地位并未得到法律认可,返回故里遥遥无期;土地所有权诉讼无人问津;宪法起草委员会将努比亚人集体排除在外;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虽接受了埃及住房权利中心的请愿书,但未给予任何直接回应。一言以蔽之,“一·二五革命”的果实与努比亚人的期待显得毫无关系。

2013年7月,埃及军方将穆尔西赶下台,废除2012年宪法,并随之启动了新宪法的起草工作。临时总统曼苏尔任命10人委员会和50人委员会两个宪法小组,分两个阶段起草宪法。努比亚人代表首次参加了50人小组的宪法起草委员会。9月,作家奥杜尔被任命为宪法大会委员。2014年1月,全民公投通过的新宪法首次将“努比亚”及“努比亚人回迁祖居之地”写入第236条,对解决努比亚人问题作了框架性规定:“政府将设计并落实一套在边境地区、落后地区和城市的全面经济发展计划,包括上埃及、西奈、马特鲁(Matrouh)和努比亚地区,上述地区的居民将参与该计划。自宪法颁布生效之日起,鉴于当地社会文化和环境背景,依本法规定,政府将在十年内让他们优先获益,依本法规定,政府将在十年内精心设计并落实努比亚居民回迁祖居之地并开发这些地区。”对努比亚人来说,新宪法第236条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标志着努比亚人问题的解决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即已经从争取回归权的承认转变为对回归权的落实上来。

2014年2月,塞西的总统竞选团队在“脸书”(Facebook)上发布的竞选活动视频中,塞西会见努比亚人的社区代表,并同他们讨论开发努比亚地区和上埃及的计划,受到努比亚人的强烈支持。即使

在卢克索部族冲突事件发生后,努比亚人对塞西的支持热情并未减弱。在塞西竞选总统的宣传片中,一位努比亚居民用方言说:“我是努比亚人,我选总统,我就选塞西。”但同年4月1日,塞西在开罗接见努比亚人领导代表团时,并未承诺他们重回纳赛尔湖岸边居住的要求。在5月纪念尼罗河改道和阿斯旺大坝建设50周年纪念活动中,埃及政府对是否在纳赛尔湖边安置努比亚人问题也只字不提。因此,奥杜尔认为:“埃及政府在纪念活动中没有涉及努比亚人的权利,表明努比亚人问题又被忽视了。”

但事实偶有不同,塞西政权对努比亚人问题的清醒认识和尝试解决的行动,令之前政权望其项背。塞西就任总统不久,埃及政府依据宪法开始解决努比亚人的相关问题。2014年9月,埃及过渡司法部成立“努比亚恢复和重建委员会”,负责落实有关努比亚地区发展的宪法条款,起草与回迁相关的具体法律。该委员会由过渡司法部部长领导,有25名成员,包括8名公众人物、努比亚裔律师和1名努比亚最大部落的首长。2015年2月,过渡司法部长易卜拉欣·赫内迪(Ibrahim al-Heneidy)向媒体表示,埃及政府正考虑以最佳方式保证努比亚人从他们的祖居之地获益。同月,努比亚恢复和重建委员会将拟定的三份“努比亚地区复兴与发展”的法律草案中的一份递交给内阁会议审议。

但是,塞西政权困难重重,虽有复兴埃及的雄心,但前景黯淡,各种发展计划不得不推迟,甚至下马。如2014年8月,埃及政府启动在纳赛尔湖周边开发建立新城的计划,因缺乏足够资金而不得不暂缓施行。同时,埃及政府的某些举措又与有效落实努

---

“Sisi Begins Candidacy Procedures”, *Mada Masr*, April 2, 2014.

2014年4月4日至5日,埃及卢克索省的支持穆尔西的一个阿拉伯部族和支持塞西的一个努比亚家族之间因政治歧见发生暴力冲突,该事件导致至少23人死亡,31人受伤。参见 HaggagSalama, “23 Killed in Bloody Feud Between Arab, Nubian Families in Egypt”, *The Associated Press*, <http://www.ctvnews.ca/world/23-killed-in-bloody-feud-between-arab-nubian-families-in-egypt-1.1762361>, 查阅时间 2017年1月2日。

“From the Campaigns: Sisi Pulls a No-show in First TV Ad.”, *Mada Masr*, April 25, 2014.

Ayah Aman, “Egypt’s Nubians Demand Rights on Aswan High Dam Anniversary”, translated by Tyler Huffman, *Al-Monitor*, June 9, 2014.

Ahram Online, “Egypt Forms Committee to Draft Law for Nubian Resettlement”, October 8, 2014, <http://english.ahram.org.eg/NewsContent/1/64/112628/Egypt/Politics-/Egypt-forms-committee-to-draft-law-for-Nubian-rese.aspx>, 查阅时间 2017年1月2日。

“Egypt Forms Committee to Draft Law for Nubian Resettlement”, October 8, 2014, <http://english.ahram.org.eg/NewsContent/1/64/112628/Egypt/Politics-/Egypt-forms-committee-to-draft-law-for-Nubian-deve.aspx>, 查阅时间 2017年1月2日。

“Minister:Government Mulls Best Means for Land Allocations to Nubians”, *Egypt Independent*, February 15, 2015.

比亚回迁计划相悖,如2014年11月第44号总统令引入“无须示警”程序后,在无任何提前通知的情况下,埃及政府决定在埃及和苏丹边境建立一个庞大的军事区,给努比亚人的回迁之路蒙上阴影。虽然“恢复和重建委员会”的部分委员已经指出总统令违反宪法规定,但这件事至今悬而未决。2016年2月,埃及议会又批准了上述总统令涉及的商业开发计划,被认为堵塞了努比亚人的回归之路,引起数十名努比亚人在阿布辛贝尔神庙处的集体抗议。同年11月,约700名努比亚人组成“努比亚人回归车队”,在阿斯旺省静坐示威,封堵阿布辛贝尔-阿斯旺高速公路,抗议埃及政府出售其祖居之地,要求政府落实“回归权”。在前国防部长坦塔维和阿斯旺省省长前往协调未果的情况下,军警与示威者发生了暴力冲突。11月31日,埃及总理伊斯玛仪和议会发言人阿尔(Ali Abdel-Aal)与努比亚活动人士进行了长达7个小时的谈判,承诺研究相关解决办法。12月1日,努比亚人宣布结束长达两周的抗议活动。但是,2017年1月埃及政府突然宣布,废除努比亚人对阿斯旺西部地区138块土地的历史所有权,逮捕了组织集会抗议的8名“努比亚人回归车队”的青年成员,并对努比亚人总会主席阿兹密(Mohamed Azmy)发出逮捕威胁,要求其解散努比亚人总会、冻结总会资产。2017年9月2日,努比亚

人在阿斯旺市再次组织示威游行,抗议政府的“新河谷”商业开发计划,要求回归祖权之地。埃及政府则以“煽动抗议、无权抗议和破坏公共安全”之名逮捕了24名努比亚人。显然,埃及政府的新近举措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增加了努比亚人对塞西政权的失望,更让外界看到了埃及政府违背新宪法的一面。

努比亚人问题是一个跨越时代且牵涉复杂的历史遗留难题,埃及共和国政权主要寻求一种发展方式解决这一问题。纳赛尔政权以“发展”的名义,让整个社会认为努比亚人的迁移合情合理,搬迁是为了实现发展权,但这种发展权在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偏离了轨道,导致努比亚人丧失更多基本权利,且被严重边缘化。塞西政权虽然重回发展解决方式,将努比亚等偏远地区的发展和努比亚人的核心关注——回迁权——直接联系起来,但从解决问题的最终结果看,努比亚人问题仅仅在其要求的回迁权上获得了宪法体现,其他被剥夺的基本权利和不断被边缘化的事实也还在继续,甚至更加恶化。可以预判,如果埃及政府不能在宪法约定的十年之期内解决好努比亚人的回迁工作,努比亚人及其衍生问题对埃及社会稳定和发展的负面影响程度将会不断扩大。

(责任编辑 孟钟捷)

---

Maja Janmyr, "Egypt's Parliament Crushes Nubian Right of Return to Ancestral Lands", <https://www.opendemocracy.net/north-africa-west-asia/maja-janmyr/egypt-s-parliament-crushes-nubian-right-of-return-to-ancestral-lands>, 查阅时间 2017年1月2日。

"Egypt: Nubians Continue Sit-in Against Sale of Their Ancestral Land", AswatMasriya, November 21, 2016, <http://al-lafrika.com/stories/201611211319.html/>, 查阅时间 2017年1月2日。

"Egypt Asks Tantawi Help Resolve Nubian Sit-in", <https://www.middleeastmonitor.com/20161122-egypt-asks-tantawi-help-resolve-nubian-sit-in/>, 查阅时间 2017年1月2日。

Haggag Salama, "Nubians in Egypt Block Road to Demand Land Rights", <https://federalnewsradio.com/government-news/2016/11/egypts-minority-nubians-stage-rally-demand-land-rights/>, 查阅时间 2017年1月2日。

"Egypt's Nubians Fight for Ancestral Land Earmarked for Mega-project", <https://www.theguardian.com/global-development/2017/feb/13/egypt-nubians-fight-for-ancestral-land-earmarked-for-mega-project>, 查阅时间 2017年6月12日。

Hadeer El-Mahdawy, "24 Nubian Activists Detained for illegal Protest in Egypt's Aswan", Ahramonline, <http://english.ahram.org.eg/NewsContent/1/64/276560/Egypt/Politics/-/Nubian-activists-detained-for-illegal-protest-in-.aspx>, 查阅时间 2017年9月25日。

另一个时代里发生的值得注意的那些东西”。“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代性是全部历史的本质特征，历史与生活是统一的关系”。这些史学的经典话语都在强调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当代社会，历史学的根本目的在于为现实社会服务。古代的历史书写侧重于政治史和军事史，是因为历史学的主要用途在于为统治提供政治借鉴。到了近代，由于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和激烈的阶级斗争，历史研究和书写更多地聚焦在民族史和革命史上，以激发民众的爱国精神和革命热情。而目前历史学界所倾力的现代化史、全球史和文明史则是对当代世界经济和科技的迅猛发展，工业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这新时代的有力回应。

历史学正是通过把握时代脉搏、关注重大社会

问题而彰显其社会价值。正如英国著名史学家爱德华·卡尔所述：“伟大的历史，恰恰是在历史学家对过去时代的想象为他对当前各种问题的见识所阐明时才写出来的。”“历史学家的工作正是沟通过去与现在，从一个时代里发现另一个时代，如果缺乏对生活的关注，历史将会变成纯粹为了满足好奇心的精神奢侈品。”这一观点对我们当今的历史教育教学也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在教学内容的选取上要贴近社会，贴近生活，关注和回应当代重大社会思潮和社会热点问题，以历史特有的角度去思考当代社会面临的问题，鼓励学生应用历史知识对一些现实问题追根溯源，以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路径。

(责任编辑 李月琴)

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第57页，第36页，第37页。

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页。

(上接第140页)

#### The Formation of “Lungs of City” and Green Space Construc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Britain

(YAN Yufang)

“Lungs of city” as a personified concep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green space construc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This metaphor emerged with the rise of “miasma theory” and “natural system”, when lots of green spaces disappeared as London spread out. With the promotion of public health reformers, its original meaning changed from “cleaning the air”, “reserving fresh air”, “places for breathing”, “public recreation places” to green practices, such as park construction, common preservation and burial grounds transformation into parks, which achieved great success. “Lungs of city” metaphor was duplicated and reproduced in its formation. It enabled the public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 protection to rise. It well responded to the social concern of that time and also served the contemporary green politics.

#### Historical Consideration about the Nubian Issue

(ZHAO Jun)

The Nubian issue, which originated in Egypt under the British colonial rule, is a historical problem that remains till now. Under Nasser and Sadat’s rules, the Nubian issue was prohibited from being discussed in public. In the late Mubarak regime, the major events of the time provided the opportunity of ethnic mobilization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for the Nubians to strive for their basic human rights. Under the Morsi regime, the Nubians made claims for “the rights of resettlement in the ancestral land” again and again through forming a cohesive force and an internal ethnic linkage. In 2014, The Nubian issue was written into the new constitution, which has become a milestone in the Nubian appeal for collective rights. However, the Egyptian government is still difficult to solve the Nubian issue completely. The Nubian issue as a potential negative factor will profoundly affect the social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of Egypt.